

YOU SI YU TAN SUO

忧思与探索

——宏观经济和企业管理热点问题刍论

HONGGUAN JINGJI HE QIYE GUANLI REDIAN WENTI CHULUN

胡建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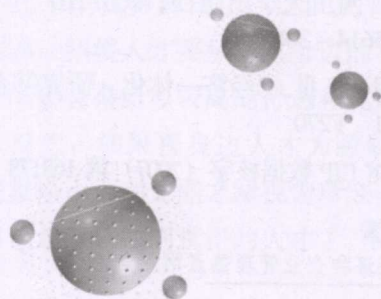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学出版社

忧思与探索

—— 宏观经济和企业管理热点问题刍论

YOU SI YU TANSUO
HONGGUAN JINGJI HE QIYE GUANLI REDIAN WENTI CHULUN

胡建勇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思莹
责任校对:王 平
封面设计:翼虎书装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忧思与探索:宏观经济和企业管理热点问题刍论/胡建勇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 - 7 - 5614 - 3867 - 1

I. 忧… II. 胡… III. ①经济一体化 - 研究②企业管理 - 研究 IV. F114.41 F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8178 号

书名 忧思与探索

——宏观经济和企业管理热点问题刍论

著 者	胡建勇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4 - 3867 - 1/F·528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0 mm × 202 mm
印 张	4.25
字 数	9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话: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序 言

饶有兴致地读罢《忧思与探索》书稿，欣然同意应作者之请作序。

这篇序言并不直接推荐或介绍该书，而是通过述说作序者自身的感受来唤起读者对此书的关注和喜爱。

第一个感受是感动。诚如作者自序所言，本书是在忧思中完成的：既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之忧，亦有忧国忧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忧。这些忧思凸显了作者的赤子之心，令人真切地看到中国古往今来仁人志士的高贵品质和传统价值观在新一代民营企业家的传承。比如在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文章中，作者跳出自己所从事的企业经营管理的狭小圈子，以心系国家、放眼全球的宽广胸怀，从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现象中理出头绪，从三大视角和八个层面分析了全球化时代的新经济，并进一步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为依据，探讨了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应争取的共赢格局，探讨了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正确途径，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对于政府有关部门处理相关问题可能也有参考价值。更可贵的是作者立足长远，提出了经济全球化时代风险防范的诸多构想和建议，涉及优化产业结构、确保战略物资供应安全、健全金融体

制、占领经济全球化的几个关键制高点等方面的建言献策。读毕全书，掩卷沉思，读者定能理解作者为何会常在心中默念“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第二个感受是欣喜。学术论文的生命在于科学性、独创性。这部书稿吹来的是一阵令人愉悦的清新之风，在许多问题上见他人所未见，言他人所未言，看不到令人厌恶的陈词滥调和东抄西掠的“网上速成”。在关于企业经营管理（包括人力资源管理）的几篇文章中，立足创新，对许多问题作了有益探索，对相关问题本身和在方法论上对读者都会有启迪作用。比如，作者把老子的“周行不殆论”和黑格尔的“圆圈论”结合起来，独创性地提出了周行不殆的企业运作模式。又如，作者第一次把人力资源分解为人体资源、人脑资源、人心资源三部分，认为在人力资源开发历史上经历了强制型开发（以开发人体资源为主）、趋利型开发（以开发人脑资源为主）和综合型开发（从开发人心资源入手，涵盖三种资源）三大阶段，并列表明只有综合型开发才可能获得三种资源的最大值，使心、智、体三者进入良性循环状态。国外有人把中国称为“体力国家”，而把科技发达并具有创新精神的国家称为“脑力国家”，主张在中国投资建厂时把身体放在中国而把头脑留在本国。其实我国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是率先强调从人心资源入手，三种资源全面开发的国家，在全世界可以说是独具优势的。在《企业人力资源工作的创新探索》一文中，作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概括出了极具新意的十多条新尝试。在《战略型企业家的用人之道》一文中，作者别开生面地提出了“人弃我取的用人之道”的八条新主张。仅从以上所列几点，就可看出作者是勤于思索、勇于独创之人，读其书定能受其益。

第三个感受是振奋。作者不仅自己在创新探索中取得不少可喜成果，而且始终坚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在书中有关文章中大力宣扬创新文化，积极主张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方法创新、技术创新和各种实践创新，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企业，并提出了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新见解。作者认为，有了创新精神（包括个人创新精神和团队创新精神），才有可能培育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又分为创新思维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创新思维的生理基础是人脑。作者用图揭示了传统智力、非传统智力和非智力因素三者的关系，并借用核能释放的概念，形象化地构建了一个“创新反应堆”的模型，“反应堆”中存在着极其活跃的创新思维激活状态，大体上可以分为个体激活阶段和群体激活阶段，其中仅个体激活状态就包含10多种创新思维激活法，虽然受限于文章结构未能一一展开研究，但能引导人们去思考探索，相信今后也会成为作者的一个独立科研课题。在书中关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风险防范的内容中，也深入探讨了自主创新问题，以及和高科技自主创新相匹配的人才培养模式问题，大声疾呼“坚决改变误国误民、自欺欺人、徒具形式的人才培养模式，把建立创新型学校、打造创新型师资队伍、设置创新型考核指标体系、培养创新型人才放在高等教育的首位”，认为“只有当我国拥有大量具有创新思维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的优秀人才时，我国众多产业和产品才能构筑‘原创性’、‘自主创新’、‘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地，不再受制于人”。作者之所以总是扭着创新问题不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心目中有一个崇高目标——“更能创新的国家和更加聪明的国民”。整个人类及其每个个体的智能潜力和创新潜力是无限的，关键在于如何发掘，如何引导，如何训练。如果能有计划、有组

织地开展这项工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何愁不能建成创新型国家，何愁不能使十三亿中国人变得更加聪明？想到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浩大的“益智工程”，焉能不令人振奋？

书中当然难免有瑕疵或如作者自序所言的缺失错谬。在关于国际贸易摩擦的部分，面对不实之词、不公待遇和双重标准，作者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同时也偶有情绪化语言。不过我国公民有言论自由，所发表的是代表个人观点的学术文章而不是外交文件，我们可以不必苛求作者。总的来说，瑕不掩瑜，这是一本好书，值得一读。

王恒璧

2007年八月于成都

自序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总体上能够绵延不断、经久不衰，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时时不忘居安思危，自强不息。而历代王朝的衰败覆亡，则无不发端于太平盛世时代的骄奢懈怠。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强调两个“务必”，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加速崛起的今天强调忧患意识，都与“居安思危”古训一脉相承。我国把《义勇军进行曲》由代国歌最后定为正式国歌，且歌词一字不改，同样是要国人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嘹亮歌声、铿锵乐曲的警策下始终保持危机感、紧迫感和忧患意识。

我最爱读的一篇古文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的忧国忧民情怀，虽有异于忧患意识，但同样不离“忧”字，同样强烈震撼着我的心灵。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高歌猛进的时候看到事物背后的隐忧，预先提出改革或防范的构想，总比事后补救要好一些。但这也可能引起“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非议，因此自己有时难免会有《诗经·国风·黍离》所咏“知我者谓我心忧，不

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孤独感。不过有一点孤独感也有好处，能使自己静下心来更多地思考一些问题。

办企业不能仅限于追求利润，也不能仅限于为社会增加财富、为国家增加税收、为大众增加就业岗位，这些我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了。我还想在自己所处的社会“坐标点”上，结合自己的工作，在宏观经济（本书只涉及经济全球化）和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贡献一些管窥之见，不知能否成为在运作民营企业之外对社会的额外贡献。

由于心中常默念“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故定书名为《忧思与探索》。愿以此就教于读者诸君。

目 录

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挑战和对策 /	1
提高企业整体效能，服务企业战略目标 /	54
四川诚信投资控股集团竞争力系统运作剖析 /	63
战略型企业家的用人之道 /	74
公司治理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	89
培育创新文化，提升创新能力 /	98
企业人力资源工作的创新探索 /	108
后 记 /	128

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挑战 and 对策

第一章 经济全球化与新经济

“经济全球化”是对当代世界经济的外延表述，而“新经济”是对当代世界经济的内涵表述。在探讨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有必要先了解新经济的科学含义。这样，在论及经济全球化时，也就不言而喻地包含了新经济的科学内涵。

美国《商业周刊》主编斯蒂芬·谢波德指出：新经济具有“二增二低二升”六个特征（实际 GDP 大幅增长，公司运营利润明显增长，社会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国际贸易进出口之和占 GDP 比例上升，GDP 增长中高科技贡献率上升）。中国多年来应当说是高增长和低通胀的典型。然而，谢波德概括的六个特征实际上主要涉及新经济所产生的结果，而未触及新经济的实质和内在动因。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萧琛教授在比较关于新经济的“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等提法后，认为这些提法虽然也能使新经济明显区别于传统经济，但它们只能体现经济的内在驱动要素，而不能较好地反映新经济在地缘空间上的广阔联系和突飞猛进，即经

济全球化和无国界经济等问题。

萧教授认为，新经济的实质主要是信息化和全球化，只有网络经济才能更好地界定和表征新经济，因为网络经济既具有驱动要素“信息化”的内涵，又具有合作依存机制“全球化”的外延。

显然，萧教授的概括更为科学确切。新经济的许多现象和问题，用网络经济就能获得合理的解读。因此也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新经济、网络经济三个概念并无实质区别。没有网络信息技术，就不会有“扁平世界”，也就不会有新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循着这个思路进行思考，我们可以从三个视角对经济全球化进行探讨研究：第一，从进入“新经济圈”的国家的国内视角看企业资产的新形态，经济结构的新变化，市场环境的新生态；第二，从进入“新经济圈”的国与国关系视角看蛙式跳跃性发展的常态化，杠杆效应的非对称化，成熟经济体的日渐趋同化；第三，从全球经济视角看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高度依存性，全球经济动态平衡的脆弱性和重大经济灾难的联动性。

一、从新经济圈国家的国内视角看新经济

这里所称“新经济圈国家”主要指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协定的国家，特别是加入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国家。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未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或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不一定不属于新经济圈国家，如俄罗斯；反之亦然。

（一）新经济条件下企业资产的新形态

在网络经济时代，依托于网络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传播，特别

适合文化产业等无形资产或非物质资产的积累和发挥作用。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无形资产在企业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广义地说，企业品牌、产品商标、特许经营权、企业信誉、客户关系、人才储备、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企业形象设计等等，都属于企业无形资产。据统计，在欧洲 98 家上市企业中，非物质资产平均占企业总资产的 60%；在 7 个领域选出的 18 家企业中，这一比例甚至超过 70%；即使在房屋建筑和公共工程领域，企业无形资产（含合同、市场份额、开发能力、企业信誉等）所拥有的份额也高达百分之六七十。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无形资产借助网络“翅膀”，价值不断上升，对企业发展起到决定成败的作用。在整个欧盟范围内，文化产业的收入是汽车制造业的两倍，对经济的贡献已超过重化工业、房地产业和食品饮料业等传统产业。此外，文化产业（含影视、演艺、游戏、时装、服饰、装饰装修设计和其他设计）还特别适合个体经营、个体参与，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

（二）新经济条件下经济结构的新变化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以后，经济产业结构开始了从“重、厚、长、大、低（低端）、污（污染，例如日本由于重金属污染造成水俣病）”向“轻、薄、短、小、高（高端）、洁（环保）”的转型，大力发展以高科技为灵魂、以网络为载体的电子信息产业（信息处理技术和信息传播技术），金融产业（包括金融衍生品交易），生物和基因工程，制药和医疗器械业，节能、环保和新能源开发等产业。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研究报告称，投资计算机技术对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相当于其他投资的 3~5 倍，这就表明电子信息产业

不仅自身具有巨大经济效益，而且具有改造和提升其他产业的强大力量。现在，信息产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例在 25% 以上，年增长率近 30%；而往昔被视为美国骄傲的汽车工业在全国经济中所占比例仅为 4% 左右，年增长率不到 2%。日本在 20 世纪石油危机过后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低能耗产业，如今石油价格暴涨，“前度刘郎今又来”，日本不仅能处变不惊，而且因祸得福，乘机向全世界（包括中国）推销其上次石油危机后发展起来的节能环保技术和产品，获取高额利润。

（三）新经济条件下市场环境的新生态

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经济席卷五大洲的形势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区别只在于是自觉主动地、有备而来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还是不自觉被动地、惊慌失措地被卷入经济全球化。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全球贸易规模扩大了 25 倍。如今，世界货物贸易的 60%、服务贸易的 70%、技术贸易的 80% 由全球性公司完成。时至今日，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再局限于狭小的封闭的国内市场，而必须勇敢而清醒地面对市场经济的新的生态环境，即国内国际市场融为一体的全球市场环境，有计划分步骤地做好经济结构、经济布局、经营方式、机构设置、法律法规、人才储备、运作手段、金融改革及避险工具设置等方面的筹划和转轨接轨工作。经济全球化（或新经济）、网络经济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是一个“机遇共风险并存，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利害兼备的“经济八阵图”，要善于趋利避害，进退自如。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时，有人把这一方针与西方列强强加于我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相提并论，实在是荒谬透顶。世纪伟人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不仅是为了引进

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而且是在把经济全球化想透彻了、看透彻了之后作出的融入全球经济的英明决策。现在中国已是国际贸易第三大国，并即将成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第三大国，拥有外汇储备达 1.3 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即使是高度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不能只讲国内的市场经济而无视全球市场经济新生态。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开始前（1970 年前），美国以拥有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而自傲和自满（这一点不同于资源匮乏、国土狭窄、经济规模较小的欧洲各国），但后来也既广又深地被卷入了经济全球化。除加速发展跨国公司和扩大对外投资外，国际贸易也随之提速。1992 年与 1972 年相比，短短 20 年，仅出口额在美国 GDP 中所占的比重就从 4% 增至 7%，现在估计已达 10% 以上。

二、从新经济圈国与国关系视角看新经济

（一）蛙式跳跃性发展的常态化

列宁曾指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相关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这种不平衡性更趋常态化，一些在经济发展上相对落后的国家更是频繁地出现蛙式跳跃性发展，这是不以某些国家喜怒哀乐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情况既发生于发达国家之间，也发生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以日美两国为例，1972 年时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还不及美国的 1/3，然而 20 年后的 1992 年，日本人均 GNP 却比美国高 10%。近 30 年来，德国也在越来越多的方面把英、法两国甩在后面。至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蛙式跳跃的原因各不相同，如国际分工原因、劳

动成本原因、资源原因、市场原因等。有些人把中国的蛙式跳跃归因于中国拥有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从而能大量吸收外资。这种认识至少是片面的。英特尔公司总裁保罗·欧德宁说：“对我们来说，中国是增长最迅速的核心市场。我们坚持不懈地向拥有巨大潜力的市场投资，以便能更好地满足顾客的要求。”可见，贴近市场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选择投资建厂、建研发基地的地点的主要依据。英特尔公司决定在大连和成都进行最大的海外投资绝不是偶然的，它计划中的商品供应对象不仅包括中国的电子、汽车和电信等行业，还包括中国本土的大型和超大型电脑生产商。例如，联想集团不仅在国内市场的份额超过 25%，而且在收购 IBM 个人电脑部分后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电脑供应商。以全球 500 强为代表的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到 20 世纪 90 年代，跨国公司承担了世界商品贸易的 75% 和技术贸易的 80%），是中国实现蛙式跳跃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制造业方面，以造船业为例，2006 年中国的新船订货手持订单已居世界第二，超过了日本，预计一两年内将超过韩国而跃居全球第一。2001 年至 2006 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了 4 倍，大学毕业生人数也增加了 4 倍，中国每年的研发投入已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每年新增专利已超过德国而排名全球第四，生产技术的提高和高素质劳动大军进入市场已使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达到美国的 2 倍以上。

（二）杠杆效应的非对称化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阿基米德曾说过：“给我一根杠杆，我能撬动地球。”以小搏大的非对称化力量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或网络经济时代并不少见。比如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就能充分发挥

资源作为杠杆的支点的特殊作用，获得更大的国际发言权和游戏规则制定权，从而推动世界经济新格局的出现。例如，俄罗斯、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伊朗等资源大国正在全球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英国《金融时报》冠以“新七姐妹”美称的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巴西石油公司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掌控着世界油气产量和油气总储量的 1/3。相比之下，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英荷壳牌石油集团等“老七姐妹”现只占有世界油气产量的 10% 和总储量的 3%。高盛公司 2007 年初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1991 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时，全球市值最高的 20 家能源公司中，55% 是美国公司，45% 是欧洲公司；仅仅过了 15 年，全球 20 家最大能源公司中，35% 属“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35% 属欧洲，30% 属美国。真是今非昔比，恍如隔世！至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杠杆效应，将在本文第二章中述及。

（三）成熟经济体的日渐趋同化

后进经济体在通过跳跃式的发展去追赶和逐步赶上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科学、技术、工程、设计、信息、组织、管理、企业文化、市场运作熟练程度等方面向发达经济体逐渐靠拢，原先的后进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或增长率将会相应地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二者“落差”的缩减必然导致原先的后进经济体“势能”的减小。应当说这符合世界不同经济体发展的“经济趋同法则”。在 20 世纪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阵飞行”中，日本的相对经济水平率先赶上美国，随后是亚洲四小龙紧紧跟上，进入 90 年代时形成了所谓的“趋同俱乐部”，即形成一个经济都很健康并且